



蔣伯誠像

(蔣梅瑛供稿)



蔣志英像

(蔣梅瑛供稿)



蒋鼎文像

(迪夫供稿)



盘山小学

(士安供稿)



宣铁吾像

(徐 范供稿)



俞叔平像

(俞运川供稿)



陈德法像
(何炎供稿)



陈 行像



邱宗岳教授
(风达供稿)



周诚汧像
(陈佩贞供稿)

目 录

浙江都督蒋尊簋.....	(1)
怀念父亲蒋伯诚.....	(8)
回忆我的叔父郭忬.....	(18)
忆郭忬.....	(26)
郭忬生平事略.....	(29)
我所知道的蒋鼎文.....	(32)
蒋鼎文与盘山小学.....	(38)
蒋鼎文生平.....	(47)
宣铁吾生平事迹.....	(56)
怀念宣铁吾将军.....	(68)
回忆表兄宣铁吾.....	(69)
忆宣铁吾同学.....	(73)
我所知道的宣铁吾.....	(77)
我的父亲杨彬.....	(80)
陈德法师长抗日传略.....	(83)
国民党中将杨步飞生平简介.....	(91)
被日寇杀害的国民党中将蒋志英.....	(95)
冯圣法的经历.....	(98)
冯圣法的表弟谈冯圣法.....	(100)

我所知道的几个国民党将领.....	(102)
周兆棠.....	(102)
邵企雍.....	(103)
周熙龙.....	(104)
周 浩.....	(106)
戚永年.....	(108)
我的胞兄俞叔平.....	(109)
何燮侯与北京大学.....	(113)
陈季侃传略.....	(117)
叔侄一家二县长.....	(119)
我的父亲陈行.....	(121)
陈行一家.....	(126)
忆周诚游二、三事.....	(130)
我的父亲邱宗岳.....	(134)
怀念邱宗岳教授.....	(140)
邱宗岳教授.....	(145)
邱宗贤传略.....	(148)
悼陈元达烈士.....	(150)

浙江都督蒋尊簋

何 德 康

蒋尊簋（1882—1931），字百器，又名伯器。诸暨县紫东乡澂山村人。早年求学于杭州求是书院（今浙江大学前身）为该书院高材生。戊戌政变之后，随着所谓新政的推行，蒋尊簋于1900年4月，以官费选送日本留学^①。初为成城学校近卫骑兵连队，后升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于1904年第三期毕业。蒋尊簋和海宁蒋方震（百里）同以精究军事学著称，章炳麟把他俩并称为“浙江二蒋”。时人又以之与蒋百里、蔡锷目为“南方三杰”^②。

留日时的民主活动

蒋尊簋的父亲蒋智由，光绪举人，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眼见国家民族陷入危亡境地而深感不安，内心孕育着一股革新之志。当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戊戌维新变法失败，证明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蒋尊簋既受其父革新思想的影响，也从中吸取了教训，认识到只有抛弃改良主义道路，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当他留学日本后，即同其他进步分子一道，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的作品，如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作为自己的必读书。另一方面，又积极筹备创办刊物。1902年10月，浙江留日学生组织同乡会。1903年2月，同乡会成员从爱国爱乡的热情出发，分析国际形势和国家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将刊物定名为《浙

江潮》。大力宣传民主思想，批判改良主义，抨击清政府的腐败政治，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作思想准备。蒋尊簋不但担任该刊编辑，并为该刊的论说栏和军事栏写专著，号召“励独立之气，复自主之权，集竞争之力，鼓爱国之诚，以与暴我者相抗拒、相角逐^③”。鼓吹进取的尚武精神。

浙江的爱国人士，为研究时事、宣传革命思想，在杭州成立“浙会”，不久被清政府取缔，后改名为“浙学会”，继续活动。1903年10月，“浙学会”在东京的成员召集会议，蒋簋簋、王嘉伟、许寿裳、沈颀民等十多人参加。会议分析了当时国内“拒俄”运动，及日俄将爆发战争的形势，认为这是在国内发展革命的好时机，计划在浙江等省实行武装割据，作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认为应该邀请浙江的革命志士参加，由陶成章回浙江活动。1904年，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在上海成立“光复会”。同年冬“光复会”成立东京分部，蒋尊簋、孙翼中、许寿裳、鲁迅先后入会。这样，东京与上海遥相呼应，光复会的名声大振。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日本，商量组织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并在东京进行筹建工作，蒋尊簋积极参与，在加入同盟会的同时，蒋被当选为宣传部长^④。从而全力投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一）回浙后的军事准备

（一）回浙后的军事准备

（一）回浙后的军事准备

甲午战争的惨败和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兴起，迫使清政府逐步淘汰旧武绿营，编练一支新式军队。1903年清政府成立练兵处。1906年蒋尊簋应浙江巡抚张曾扬的聘请，任命他为教练处帮办，及浙江讲武堂总办，并筹编新兵第二标任标统（团长）。

蒋一面编练新军，一面又在杭州海潮寺设立弁目学堂，并任总办。一批急求上进的青年，得到弁目学堂开办的消息，积极报名入学。蒋尊簋在日本时已被选为同盟会宣传部长，这时他借新军、讲武堂和弁目学堂为阵地，又与浙江武备学堂的伍元芝相配合，在师生中积极灌输民族主义思想，宣传民主革命，同时把当时浙江革命据点——绍兴大通学堂的毕业生，也吸收进弁目学堂，使这批经过民主革命思想教育的毕业生，充当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同时还帮助建立陆军小学堂和炮工学堂，为浙江发展陆军特种兵和辛亥革命光复浙江，打下了基础。

1907年7月，徐锡麟安庆起义事败，秋瑾涉案被捕。蒋尊簋不避危，主动站出来，并说“关于秋案，无论如何危险，尊簋可以设法^⑥”。不料在秋家查抄中，发现秋瑾诗稿，内有赠蒋而未署名的长歌一首，其中有“久闻吾浙有蒋子，未见音容徒仰止”句，被浙江巡抚积疑，即暗示第一标标统李益智监视和牵制。李性情暴戾，扬言蒋尊簋与秋瑾早有瓜李之嫌，煽惑浙抚进一步严密监视蒋的行动。最后，虽没有真凭实据，但仍于第二年另调广西。当蒋尊簋被迫离开浙江前往广西练兵的时候，约集赵正平、夏超等人前往，决心在边陲树一旗帜。到广西后，被任命为兵备、参谋、教练三处会办，又继蔡锷之后任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1909年调任广西参谋处总办。1910年离广西调广东，任混成协协统（旅长）。

担任浙督 颇孚众望

辛亥革命（1911年9月），广东省成立都督府，任蒋尊簋为军事部长，当时实际权摄广东都督^⑦。9月15日浙江光复，人们主张“浙人治浙”，公举汤寿潜为都督。蒋尊簋也以

浙江人的原因，被电请返浙，任浙江水陆各军军统。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改元为中华民国。光复初的浙江都督汤寿潜改任交通总长。各方请陶成章继任。陶则推荐蒋尊簋，并向报界发电说：“仆自维榘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劝驾。”^⑦ 鉴于浙江光复时的党争十分厉害，内部局势仍很混乱，蒋感到力不胜任，再三推辞。而全省各属代表一致欢迎蒋尊簋继任，许多在日本留学时的老同学，以及他的老部下，也都劝他继任，他的好友蒋百里也对他说：“这个时候不出来办事，我们拿什么面目去见人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蒋尊簋才答应继任，并聘请蒋百里为总参议，襄助之。1912年1月16日蒋尊簋正式宣誓就任浙江都督，并兼任民政长。蒋就任后，根据浙江当时实际，发出了《敬告全省父老书》，表示愿与父老们共同“为人民保治安”实现“农安于野，商安于市，工安于肆，士安于校，共和改造时代，当不使一人有废时失业之忧”^⑧。二月，与章炳麟、汤寿潜、张謇、熊希龄、唐绍仪等组织“统一党”，将都督府略加改组，有关工作分科办理；并组织浙江都督府参议会，以都督为主席，各厅厅长及中高级长官为参议员，不支薪水，以统一政令。接着又颁布一系列改革文告。并设立备荒事务所，令民政司提公款派员赴沪，购米运浙，以安定1911年水灾后缺粮的恐慌情况。为解决“市面凋敝，金融窒滞”颁布《维持市面公债简章》^⑨，以及命令革除繁苛杂捐的前提下，仍行厘金制度，以周转商事全局，补助行政经费。在改革社会陋习方面，颁布《浙江实行禁绝鸦片决议案》^⑩，并与英国驻沪领事交涉，不得有碍禁烟。发布《禁止缠足文》，令各县知事教育人民，禁止缠足。为维护人权，令各县知事、执法长，不准刑讯，并焚毁一切刑具^⑪；设测量局与测量学校，编制浙江地图，等等。

蒋尊簋担任浙江都督后虽然时间不长，但这一系列措施，对安定全省，刷新内政，有较大建树，深孚众望。

赔钱卸职 继续反袁

同年五月间，正当蒋尊簋为进一步保持浙江的稳定局面，急欲办好省议会，因而积极制定浙江省议会法和选举法，同时一边订一边勒令各县执行。时袁世凯在北京，为实现其登上皇帝宝座的野心，搜罗各方亲信，作为心腹爪牙，分布各省，借以自固。由于蒋尊簋不为袁所笼络，遭到袁世凯的歧视、并有撤换之意，正好抓住《浙江省县自治章程决议案》没有呈报中央批准这个借口，先把主持这项工作的褚慧僧撤职，接着又命浙军驻南京司令官朱瑞回浙。朱瑞虽在蒋尊簋部下当过事务官，但这时已恃功自傲，对蒋也不谦让，竟有夺权之意。然而蒋尊簋乃众望所归，朱一时虽不敢直接攻击，但暗中施展阴谋：一面罗织浙江财政支绌，党派和军队内争纷繁、局面混乱等情况，向袁世凯报告，暗示驱走蒋尊簋；一面又使出种种手法，把蒋尊簋的得力助手陈仪逼走，使蒋行事艰难。蒋尊簋觉得不值得同这些人相处，同时又感到袁世凯为人奸险，于是电请辞职。7月22日照准后，袁就派朱瑞为浙江都督。那时都督府的经费很有限，帐算下来，超支的五千元，都归蒋尊簋一个人赔偿。幸而蒋尊簋的岳父是宁波的商人，替他交清了这笔钱。

蒋尊簋辞去浙江都督后，一度出国考察。1914年1月，被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六月，又任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宣威将军”，兼检阅使总监。接着又任两湖检阅使兼保定军校主考，北京模范军事督参等职。

1915年，袁世凯阴谋称帝，妄图将中华民国改称中华帝国，唆使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发起“筹安会”，以所谓研究国势前途及共和之利害，以筹一国之治安为由，鼓吹帝制。并推杨度为理事长，严、刘为理事，“筹安会”于8月23日正式成立。当时蒋尊簋紧密配合蔡锷的“护国运动”，于8月25日在蔡锷寓所，一面佯装愿意改变国体、施行君主制的姿态，进行所谓署名签字活动，以麻痹袁世凯，一面，蔡锷又假称有病，呈请袁世凯批准赴日疗养，之后即离京，辗转日本、香港奔赴云南起义。蒋尊簋亦随即南下赴浙响应^⑬。扑灭了袁世凯的皇帝梦。

讨逆护法

1917年继张勋的复辟之后，皖系军阀段祺瑞又赶走总统黎元洪，废除《临时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对段祺瑞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采取坚决斗争的态度，举起“护法”旗帜，通电各省讨逆救国，并电召国会议员赴广州，召开以维护国法的“非常国会”，孙中山当选为“护法”大元帅。并联合西南各省，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蒋尊簋积极投入“护法”之役，即回浙联络驻宁波第三旅旅长叶焕华，组织自治政府。十一月宣布浙江独立，并任浙军总司令，派兵进驻百官。但因遭孙传芳部孟昭月所迫，未能成功，退回宁波后遣散^⑭。也由此被北京政府褫夺勋位勋章及原有军职^⑮，蒋虽因浙事失败，但并未失去信心而仍转往东南，被孙中山委派为浙闽宣抚使，继续前往闽浙策动浙军起义^⑯。

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失败，南方军政府被挂系军阀所把持，接着“军政府”又被宣布撤销，并提出所谓“南北统一”。为

击破这一阴谋,1920年11月,孙中山在广州重组军政府,第二年五月,就任“非常大总统”,再度举起“护法”旗帜,蒋尊簋被任命为参谋次长,后历任军政部次长,代理参谋长兼滇、黔、赣联军第一路司令。十二月孙中山整理军队,组织大本营,蒋尊簋被任命为大本营高级参谋主任。1924年2月,任大本营军需总监^⑩。1926年12月,杭州各界联合商会,制订《浙江省自治组织大纲》,组织省政府,推举为浙江省政府委员,积极开展地方自治,又被任为军政长。后调任上海政治分会主席。1928年改任总司令部高等顾问、清理招商局委员会委员、全国道路协会副会长、全国赈务委员。1931年5月,宁粤分立,任广州“国民政府”委员。同年因病去世,享年五十岁。

【注释】

①《浙江近代史》251页

②④⑥《传记文学》第33卷第三期

③《浙江潮》第三期

⑤《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499页

⑦《民主报》1912年1月2日

⑧《国民文牖》卷2

⑨⑪《浙江公报》第48册(民国元年三月二十六日)

⑩《浙江公报》第16册(民国元年二月二十四日)

⑫《团结报》1935年12月28日

⑬⑮《浙江百年大事记》

⑭《民国大事日志》第一册

⑯《民国人物小传》

怀念父亲蒋伯诚

蒋梅瑛

我父蒋伯诚又名志迪，生于1888年4月16日，浙江省诸暨县湮浦镇人，少年就读私塾，为人正直，青年时代因不满清朝政府政治腐败、丧权辱国，毅然投笔从戎，离别了父母弟妹及安宁的生活，考进杭州师范学堂，因家庭贫寒无法攻读，又考入苏州武备学堂。毕业后，又进保定军校当教官。我祖父蒋任山对我父亲的反清反封建思想极为支持，故而我叔父蒋志英亦继我父从军，（我叔父蒋志英在任浙东海门要塞防守司令时，指挥军队与日寇激战而壮烈牺牲），他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对清廷和军阀的国民革命，在二十年代中期任孙中山先生组织的革命政府北伐第一路军总司令何应钦的参谋长，自广东攻入福建、浙江，击溃了北洋军阀孙传芳，1927年收复浙江后，父亲任浙江省军事厅厅长，省保安司令之职，年后因省政府主席何应钦因故未能到任，由父亲代理省政府主席，此后调往北平（今北京），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代表职务，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授上将军衔。在这期间由政务及军事上的联系和张学良接触较多，感情倍增，随之义结金兰之交，故而在西安事变时父亲在幕后也做了很多工作，促使事态和平解决。在1930年奉蒋介石令赴山东济南，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表的身份与山东军阀韩复榘周旋，要韩以国家民族为重归属中央，团结一致，在父亲的积极联络协调下，终于使韩复榘将军率部响应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即受命当时的国民政府担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集团军

总司令之职，化干戈成玉帛，使众多百姓免受一场战火灾难。

当我父亲在山东济南工作时，结识了我母亲杜丽云，母亲系京剧演员，师承王瑶卿先生，刻苦习艺，登台演出，一举成名，被评为四大坤旦之一，那时母亲至济南献艺，韩太夫人（韩复榘的母亲）极为赏识，至深喜爱，即认我母亲为寄女，当时我父亲的夫人（后我称阿妈）的张惠贤身患肺病，那时的结核病乃是不治之症，且易传染，因此我父亲与阿妈分居两地，在杭州盖造一所住房给阿妈静心疗养，韩复榘鉴于我父亲未能携带家眷，出于关心，又能拉拢关系，且与我父亲是结义兄弟，就由他提议作伐将我母亲按韩家女儿的礼仪下嫁我父亲，结婚证书上男女双方介绍人为张学良和韩复榘，婚后双亲居住在北平。我出生于1934年。当我还是婴孩时，1936年广东新军阀陈济棠妄图实现其独霸广东的迷梦，为击破割据局面，蒋介石遂遣我父亲赴粤策反，运筹帷幄，使用谋略，使粤军内部分崩离析，一批高级军官通电拥护中央，迫使陈济棠的分裂阴谋宣告失败而下野，恢复了统一的局面。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华战争，突发芦沟桥事变，侵略军炮轰北平城，我国军民同仇敌忾，国共两党统一战线；奋起抗敌，从此展开了全面抗击日寇的战争，年仅四岁和刚满周岁的我和弟弟，跟随外祖母正住在北平，入晚满天通红，炮声隆隆，枪鸣不绝，我那幼小的弟弟惊吓成病，北平城里正值一片混乱，无法请医诊疗，更难以送进医院，可怜的弟弟就这样被死神夺去了生命，外祖母痛不欲生，见了我父母又将如何交待；我们正处内外交困不知所措时，适得父亲自山东派人来接我们去上海，这时客运火车已中断，外祖母和我只能搭乘运送物资的铁皮车到天津，再至塘沽口乘货运船至上海，在塘沽口登船时，父亲特地赶来看望我们，那时父亲正在

山东处理韩复榘惧敌弃城逃跑而被处以极刑的善后事宜，因当时山东守将韩复榘在敌寇的凶残气焰下吓得丧魂落魄，竟然不放一枪而弃全城百姓于敌逃奔汉口，蒋介石大为震怒，为整肃军纪以敬效尤，在汉口枪决了可耻的逃兵，韩复榘被处决后，其部下及众多军队尚在鲁西，必需安抚调定和另委指挥官，父亲即受蒋介石命令赶赴山东办理善后事务并宣布由沈鸿烈接任山东省政府主席，于学忠接任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与日寇奋战。当父亲抵达塘沽并随带二件玩具准备给我姐弟，当我见到父亲扑上前去，不由放声大哭并告知弟弟已不在人世时，父亲惊呆半晌，默默地将一只给弟弟的小狗熊玩具投入水中，任它缓缓飘逝，父亲给我揩拭了眼泪对我说：咪咪（我的小名）你虽尚小，可要牢记住，这是国仇家恨，东洋鬼子肯定要失败，天总会亮的。与父亲在塘沽分别后，和外祖母挤在又闷又热的货舱内，受尽苦楚，才到达了上海，那时上海已被日寇侵占，仅在英法两租界上，表面还称平静，我母亲和大哥蒋渺沧已在上海，住法租界恩理和路（今桃江路）24号我们的私宅，外祖母和我抵达后父亲也继而在山东完成公务安排妥贴回到了上海家中，我们欢聚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好景不长，战火蔓延甚速，国家民族危急万分，由鉴于此，父亲决定将我年方十七岁的大哥渺沧送往内地中央军官学校（前身为黄埔军校）。大哥辗转敌占区域，穿越敌伪所设封锁线，千辛万苦才到达重庆，考入中央军官学校十八期学习军事（一般称黄埔十八期），学习期满毕业考试名列榜首。在我父亲倡议下，带动了在内地的要员们，多将子侄晚辈亲属送往军校，如钱大钧将二个儿子、何应钦因无子女将外甥送进军校等等，以作后备军事力量，抗击侵犯敌寇。

父亲本人则奉命组织敌后地下工作，奔波在上海香港两

地，当时香港尚未被敌占领，可作为与重庆的联络点，并奉蒋介石之命成立了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由我父亲、戴笠、杜月笙、吴开先、吴绍澍五人任常委，开展在沦陷区日寇机关和伪政权内部获取各种政治军事情报，转送陪都重庆当局的活动，并积极设法瓦解对抗战不利的势力，宣传抗日决心，揭露敌人残暴野心，以唤起广大在敌伪占领区内受尽荼毒的民众对抗战必胜的信心。地下抗敌斗争工作，是在敌寇铁蹄淫威下进行的。记得1939年有一天深夜，父亲刚从香港回沪不久，全家都已进入梦乡，突然响起电话铃声，是法租界善钟路巡捕房（现为徐汇公安分局），通知我父亲，日本虹口宪兵队正与法捕房联系，即刻要来捕捉抗日首要分子蒋伯诚，请作准备，因当时我们居住处所系法租界，日本军宪必需事先与租界当局联系，取得同意后始能捕人，父亲接到通知后，立即和我母亲作了安排，自己则在后花园内架起梯子，翻墙越至隔壁的图书馆（为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在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连夜脱身而去。但是此刻家中已被日本宪兵闹得天翻地覆，因抓不到父亲，接连逼迫母亲，手段至为狡猾，即连睡床被窝左右之冷暖亦知晓必然二人同睡，母亲急中生智分辩为我与丈夫意见不合早就分开，只和女儿同睡一床，日本宪兵见得不到口供又无证据，恼羞成怒即开始翻箱倒柜，查抄了我们的家，幸得法租界捕房陪同人员佯作一起查抄，不论华籍、法籍警员，在抄得父亲照片或书札等物均暗暗藏入各自袋中，事后都原物送还，敌宪整整扰了半日，结果一无所获，只得悻悻而归。日寇残暴成性且狐疑多虑，母亲又恐再来骚扰，即由外祖母带着我在西摩路（今陕西北路）上租了一间房屋住下，母亲自己则前往香港追随父亲，1941年11月下旬，我母亲只身一人从香港回沪说父亲搭乘下班客轮也将归家，但时隔多日，早候夜盼总未有一点